



梁啟超和

中國學術

思想史

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K827.6
48

易新鼎 著

81584

梁啟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

廖仲安



中州古籍出版社

DK24/05
(豫)新登字05号

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

易新鼎 著

责任编辑：钟林	责任校对：玉 嵩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8印张 156 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7-5348-0496-5/B·13 定价：3.80元

目 录

设想、渊源和实绩·····	(1)
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	(9)
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	(12)
关于墨家思想的研究·····	(35)
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48)
关于法家思想的研究·····	(56)
怀古上征与审己知人·····	(61)
对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衍变的分析·····	(66)
齐鲁学派与两汉经学·····	(67)
魏晋玄学与儒学·····	(74)
隋唐佛学与儒学·····	(85)
宋明理学的发展·····	(93)
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分析·····	(121)
宋明理学兴起和衰落的原因·····	(122)
历史环境与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	(131)
关于清初诸学者的评价·····	(141)
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	(175)
关于晚清诸学者的评价·····	(185)

佛教史略论及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206)
梁启超的佛学研究概况.....	(206)
初期佛教教理及印度佛教史略论.....	(209)
中国佛教史略论.....	(226)
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241)
后记.....	(251)

设想、渊源和实绩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第二自序”中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友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的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励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梁启超这个设想极为庞大，出发点也不坏，事实上却没有完成计划。据其遗存的论著看，梁氏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未写成专著，所谓“佛学史”，只留下了若干论文，很难称之为“史”。先秦诸子、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变迁，是他论述得最多的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把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一个综合归纳，总题目叫做“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这样做，有利于全面了解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看法和态度，想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思想史和学术史是两件事情，当代学术界对此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分野。思想史讨论的是哲学史的问题，学术史的内容大约更专门化一些，它应当是总结某种专门研究的发展史。梁启超当时却没有这样明确的概念，他在论著中，既讨论了各种学说、学派的形成发展问题，也讨论了某些专门化的学术变迁问题（如考据、校勘、金石等），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问题。为了免去庞杂枝蔓，我们还是把问题局限在思想、学术之内来进行归纳，太深太窄的如考据、校勘等内容只好舍弃了。梁氏号称博学多识，又善于写文章，因此，留下的论著极多。见闻广博是其优点，驳杂不精是其突出的弱点。这两点都是研究者望之却步的主要原因。我们对此所作的归纳，只图为人们了解梁启超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线索和方便，对其所作的长短得失的批评，也仅供参考。

梁启超热衷于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史，显然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最受欢迎的课，据说是“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对经学、史学、理学、佛学、考据学、今文学等，都有很深的功力，对于诗词、书法、画艺等亦有很高的鉴赏水平。自从接受“西学”思潮及廖平的影响后，他发挥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形成了体系性的托古改制的思想。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他十分注意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材。他在办学中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训练学生。“古今学术源流”的讲课，对于开扩学生眼界、贯通中西文化、促进学生成长等方面，显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据记载，康有为在讲课时，是出入儒、法、道、佛、西学等九

流百家的，他不但讲了各家学说的宗旨、倾向，还讲了它们的流变和发展。“先生博综群籍，贯穿百氏，通中西之邨，参新旧之长”（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前言》，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一书第59页），这可见康有为在讲课中把他的政治主张也渗透进去了。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中，也生动地记述了当年听课时的欢欣雀跃的情况：“先生每逾午则升座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齐齐欣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醺醺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还坦然地说，“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论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由此可见，康有为的讲学和指导，万木草堂的学习研讨，为梁启超探讨中国学术思想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对此终生不忘，也可说是一种尊师重教的美德。

梁启超“一生学问”虽得力于康门，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却非与其师持论一致。他在《清代学术

概论》一书中，十分明确地挑明了这种分歧。就儒家学派而言，他认为孔子之后，儒学“衍为孟子荀子两派，荀子传小康，孟子传大同”，汉以后虽“宗派屡变”，学人大都“盘旋于荀子肘下”，故“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为了张扬儒学正统，就必须“绌荀申孟”。他认为孟子“诛责‘民贼’‘独夫’，‘善战者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才是“大同精意所在”。这对于康有为尊孔子为“百代素王”显然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和驳正。此外，梁启超还“不嫌于其师之武断”，尤其反对那种“好依傍”和“名实相混”的“托古改制”的思想，认为“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他曾“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这个分歧，不但反映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弱点，还反映了梁启超的不为“师蔽”的优点。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史时，虽然十分推崇儒家，但对孔孟的弱点也提出了批评，这应该说是学术研究上的进步。

康、梁热衷于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史，其致用的目的也有侧重点的不同。康有为讲“古今学术源流”，显然是为把学生造就成推行其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服务的。他的讲学虽然极受欢迎，却没有形诸文字，撰成专著。他显然把这些内容放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之下了。梁启超却别有见地，他的看法约可分为两点：

第一、他认为精深博大的学术思想，有“左右世界之势力”。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就是为了催促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他在1902年所写的《论学

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说，“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一不是“亚历山大狮吼于西方”或“成吉思汗之龙腾于东土”的“威力”，二不是“梅特涅执牛耳于奥大（地）利”或“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的“权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就是人们用智慧所建树的学术思想。在文章中，他列举了哥白尼的天文学、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富兰克林的电学、瓦特的汽机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福禄特尔、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创作，认为这些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起了巨大作用的学术思想。“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西方近代学术的勃兴，都是从“希腊古学复兴”中引发出来的。梁启超显然看出了文艺复兴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社会大解放和学术大繁荣的局面。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之中，文化上也处在中外交流的高潮之中，因此，他希望中国学术界涌现出“左右世界”的学者名家，“即不能为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长兮。吾闻足音之趫然兮，吾欲溯洄而从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他的期待之情，是十分热烈的。在“学术”与“政术”的关系问题上，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

1897年，他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说过，“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日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梁启超这时的思想显然还停留在“德上艺下”“中体西用”的老套子里。待到维新运动失败，他到日本广泛接触西学之后，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看出了西方近代学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因而形成了“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的观点。不足的是，梁启超没有进一步深化这个认识。他只看到了文艺复兴引起西方的学术繁荣并推动了社会进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西方社会推动了文化学术繁荣的另一面。这就是说，社会进步和学术繁荣，是双向渗透，互为因果的，而且是同步前进的。当年的中国，既要改造社会，又要更新学术。而且，只有在改造社会实践中具有实效的学术，才会被社会承认并得到发展。梁启超没有这样透辟的认识，其见解就不免空疏失当了。此外，他当时对西方世界很有些盲目性，只见其优点，不知其弱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游历了欧洲，亲见了西方社会凋蔽的景象，他对于西方近代工业、科学技术以及一切社会思潮都表示很大的怀疑，因此在《欧游心影录》里发出了“科学破产”的

悲观论调。他对“西学”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之后，对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就更加推崇和宝爱了。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其中确有尊古崇儒的倾向，但他还企图通过中外对比和古今对比，促进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进而振兴民族国家。他的见解并非全部妥当，论述中也有许多粗疏失实之处，其用心却是很好的。

第二、梁氏认为，中外对比，博采众长，是更新中国学术思想的便捷途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也很明白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看法。他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梁氏认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态度。一是不要为近代“外国学术思想所眩”，二是不要对“本国者不屑一屑其意”，而是要从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总体中“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进而针对我民族“特质”，“淬厉之而增长之”。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他希望一切严肃正直的学者，不可“等闲视之”。他主张，不能在“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针对当时青年人崇尚“西学”的情况，梁氏别有见地地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这应该说是胆识的论断。他还指出，要使“外学”“普及于祖国”，担当“转输之任者”，一要能领会“外学之真精神”，二要“邃于国学”。只有这样，才

会卓有成效，否则，就是“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荣育宜也。”以上所述，说明梁启越是主张更新中国学术思想的，其途径是把中外学术思想融汇贯通，采取自主自立的态度，针对我民族特性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只有这样，才会引出好的效果。这种主张，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梁氏在这篇文章中，还对东西方学术思想的长短优劣进行了扼要的对比分析，为东西方学术思想比较研究开了风气。往后，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许多看法都可以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他的认识的萌芽和思考问题的线索。其时，他年仅三十岁，自称“后生小子”，学识见解，诚然说不上老练完备，但是，他从老师的讲学中获得启发，面对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局面，十分敏锐地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是青出于蓝的一个表现。

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包括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对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发展的分析、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分析、对佛教史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内容是丰富而庞杂的，下边，我们就分别进行讨论。

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是《庄子·天下篇》对先秦百家学说的一个客观的反映。各家学说虽然都自认为尽善尽美，事实上却有高下轻重之分。梁启超认为先秦诸子号称百家，显学就是儒墨道法四家。自1920年起，他研究先秦诸子，先后写了《老子哲学》、《孔子》、《子墨子学说》、《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孔老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学术年表》、《庄子天下篇释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儒家哲学》等论文或专著。其中，《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哲学》两本专论，最能反映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研究的倾向和用意。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认为上述四个学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中国四大思想潮流，这就是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它们之间不但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或借鉴关系，它们还和西方社会流行的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文明”，“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它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

西欧近二百年来产生了不少新学说，“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他们想“舍其旧而新是谋”，却“皇皇然而未得”。我国学人若是对“先民思想”加以“搜剔磨光”，就可能成为“不龟手之药”，不但有益于我民族国家，还将造福于全人类。这就是说，梁启超后期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先秦诸子），是在他欧游对“西学”失望以后，其中包含了他的发掘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精华以拯救世界精神文明危机的用意，虽然不乏尊古崇儒的成分，但也包含了强烈的爱国感情。

他在该书《序论》中还说：“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移植”外来思想或政治制度，必须在我“社会遗传共业上”进行“自然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之后，才会奏效。这说明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他是从近代历史斗争的经验出发，对古代学术思想进行“搜剔磨光”，清理出一个“国民意识”的基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论述中不但把各学派的长短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还作了古今对比、和中外对比的分析。他的论述，确实摆脱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思路，实践了他的“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的独立思考的主张。这使他的论述显得新鲜活泼，且有时代色彩。诚然，梁启超不是

思想家而是学问家，他的一些见解并非妥当，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却是有启发性的。

既然如此，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的态度就不是一味地赞扬，而是有肯定，有批评。比较而言，他认为儒家的礼治兼人治的政治主张较为合理，儒家的均安主义和尽性主义尤有利于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以及个人与社会两重矛盾。正因为这样，他的看法就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潮流形成了对立状态。他在《儒家哲学》第二章中说：“近来有许多新奇偏激的议论”，“一般人对于儒家哲学异常怀疑”，“专打孔家店”就是一种“反常的思想”。“中国文化”是以“儒家道术为中心”的文化，如果否定了儒家，就等于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存在”，这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他还认为，各种学说是因其时代地域的需要而决定其社会价值的。他说：

“共产与非共产，就含有时代性，究竟是共产相利，还是集产相利，抑或劳资调和相利，不是含时代性就是含地方性。有的现在适用，在古代不适用，有的在欧洲适用，在中国不适用。”而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利用厚生，量入为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都不含时代性，亦不含地方性”。这就是梁启超尊古崇儒反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改良派“巨子”，他采取这种态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当年的思想界，对新文化思潮持怀疑态度的人，为数还很不少。“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就学术思想来看问题，当年声讨的“孔